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东亚大局势 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编
[日] 白石隆 (Takashi Shiraishi) 译
王星宇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东亚大局势 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编
[日] 白石隆 (Takashi Shiraishi) 译
王星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美) 卡赞斯坦, (日) 白石隆编; 王星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人文社科悦读坊)

ISBN 978-7-300-20186-3

I. ①东… II. ①卡…②白…③王…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东亚②对外政策-研究-日本 IV. ①D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821 号



人文社科悦读坊

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日] 白石隆 (Takashi Shiraishi) 编
王星宇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2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1 章 不断变化的东亚局势	1
东亚的区域形成：国家模式以外	3
参与者和机制	13
超越国家模式	17
超越等级和二元论的区域进程	26
第 2 章 10 年的政治低迷：当政治逻辑战胜经济理性	33
民主和政策上的变革	36
社会经济学和宪政政治	37
没有终点的经济低迷	41
投票者反抗的障碍	42
另外一个经济议程在结构上的障碍	47
展望未来：改革对抵制	54
第 3 章 学生、闲散人员、单身者、老年人和外来者： 改变一个家庭国家	58
家庭式的日本	61
学生：通往学术成功的私人捷径和学校与工作之间联系的失败	64
闲散人员：就业冰河时期里年轻的“飞特族”	66
单身：可以说“不！”的女性	68
自立的老年人：独立的生活还是孤独的心？	71

夹在中间的外来者：揭开民族同种的秘密	74
日本的未来：以“家庭”的方式吗？	76
第4章 不可移动的目标？日本在东亚的安全政策	79
日本的外部安全政策	82
日本的社会安全政策	86
2001年“9·11”前日本的反恐政策	91
“9·11”的影响	96
第5章 创造一个区域性的舞台：金融行业的重建、 全球化和区域形成	101
日本的金融制度：危机和变革	104
全球力量：市场和国际规则	107
为金融合作创造区域空间	114
第6章 政治如何赶上市场？寻找东亚的经济区域 主义	122
塑造区域主义的因素	123
东亚的区域化	126
东亚区域主义的演进	132
区域发展中的美国、日本和中国	144
第7章 在东亚区域化中寻找新的角色：电子产业中的 日本生产网络	149
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化	151
扩大并升级和东亚的联系	153
对东亚日益增长的依赖性	154
对变革的制约：体制上的弱点	158
杂交——和亚洲公司结成伙伴关系	168

第 8 章 地区的虾、全球的树、中国的蔬菜：日本—东亚关系中的环境	172
日本可再生资源密集型进口的宏观模式	176
日本的变化：消费、零售和获取货源的策略	180
亚洲的自由化和农业工业化	182
中国的崛起	185
区域政治生态学	187
区域化、环境、全球化	190
第 9 章 狭路交锋：软权力和日本流行文化在东亚的政治学	193
日本流行文化在亚洲	195
作为想法的“软权力”	199
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新关注	201
政策结果：作为“内容”和权力的文化	207
什么样的权力？	211
将“酷”进行到底	214
第 10 章 第三波：东南亚和一个区域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构成	216
国家、市场、社会	217
东亚中产阶级的形成	221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新民族主义者	224
泰国上升的中产阶级	228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化并具有依赖性的中产阶级	232
菲律宾分散的中产阶级	242
东亚中产阶级形成的地区意义	245
各章撰稿人	250

第 1 章

不断变化的东亚局势

彼得·J·卡赞斯坦

2 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东亚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地区内的每个国家就像一根线，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线正被编织到一起，织就一幅新的区域性的画卷。区域主义（此处按习惯做法定义）和区域化（此处定义为一个需要参与的过程）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的模式。相反，它们正在把这些模式组合到一起，形成新的、不同的、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模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批评家和政客以前都是从不同国家模式的起起伏伏的角度思考区域形成。比如，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美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时，美国却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危机的预警上；人们普遍认为东亚能反映出这种国家命运上的转变，因为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就在眼前。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一个大逆转。现在，美国的实力达到顶点，日本却踌躇不前；东亚再次成为投射出这种国家命运转移的屏幕，只是这次时代变了，变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同时，中国的崛起暗示着一个新的地区大国的到来，还有印度潜伏在后方。如果我们继续愚蠢地坚持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那么中国和印度的时代将会到来，也会消逝。对于国家模式不恰当的崇拜是短暂的——似乎每个模式在衰落之前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

现在转变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东亚正快速超越任何单一国家模式，发展成为几种选择共存的局面，并且出现了真正的复合型的区域主义。本书通过具体考察日本和东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述此观点。本书会成为研究区域形成方方面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要求我们从美国和美国化、中国和中国化、印度尼西亚和伊斯兰化以及其他亚洲政体的观点来追踪这些过程，其中一些亚洲国家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的形式。因此，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着眼于小的焦点。可是，如果本书，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在东亚区域主义否认了传统上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案例研究是成功的话，那么其他的学者可以从对其他国家有利的原则出发来研究复合型的区域主义。

这个论点对于那些把日本看做一个正在衰退的政治、经济大国的人来说，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日本2002年最畅销的歌曲名字是《好的，不要当第一》（It's OK. Not be Be No. 1），这和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1979）正好背道而驰。难道中国不是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头羊了吗？难道中

国不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位置的国家吗？那么为什么要从日本的观点分析东亚区域主义？这些问题看似有道理，因为现在媒体中有很多对中国有利的报道，这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媒体对日本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奉承。但是，这些都很牵强。

虽然中国增加了它的国防预算，但就总的国防费用以及军队的技术尖端程度来看，中国仍然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区域军事大国。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一直保持持久的同盟关系。由于日本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持中立的立场，未来东亚的权力转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日本和东亚如何参与对方事务。

此外，日本经济、社会的技术尖端继续大幅度领先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依赖的是外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这样的事实制约着中国，使中国无法成为日本或美国在技术上的对手。中国自从 1978 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到 21 世纪初已经吸纳了大约 5 00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日本在 1945—2000 年间积累总和的 10 倍。2002—2003 年，外资公司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 55%，占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的 85%。外商独资企业占中国新外国直接投资的 65%，并且掌控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合资企业相比，它们更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日本、韩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外国人对中国技术的基础有更大的控制权。

总之，给予中国应有的地位和因为所有不相关的意图和目的而对日本下结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在两国的声望方面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中国显然胜过日本。但是相当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差距仍将使今天日本的地位和明天的中国可能会达到的地位有所区别。

在第一章里，我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日本化、美国化这样的过程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对于真正属于复合型的东亚地区而言，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其次，谁是东亚区域化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机制又是什么？再次，在哪个政策领域里，仍旧可以辨别出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在哪些领域里这些模式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最后，我们该如何思考东亚并分析东亚在区域构成中的新力量？

东亚的区域形成：国家模式以外

东亚不仅仅是具体的国家模式的延伸。在某些方面，日本和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

4 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

和约在塑造东亚。在其他方面，一些进程正在缔造东亚。这些进程使东亚实际上不可能摆脱截然不同的国家影响。就具体的技术、流行文化和民主问题而言，我阐述了两种情况，因此把第4章到第9章的主要结论概括一下就是：东亚正朝着某个单一国家模式影响以外的模式发展。

日本化

日本化的概念是一个抽象术语，指的是多样化的、经实践验证过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化的传播。相反，日本化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过程，包括传播、效仿以及采纳生产、消费和行为的独特的模式。因此日本化没有提供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环境下复制的清楚的模式。精心的机构设计、共同的认知模型和规范的秩序所带来的持续的渐变以及竞争性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冲突，都会导致不同模式的组合。对日本化所进行的最为细致的案例研究——美国机车工业，显示出上述所有三个机制的重要性。适用于美国汽车行业的日本化的东西也适用于东亚的日本化。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化”这个词被用来概括从旧的到新的生产范式的转变的特点。日本化指的是日本公司在出口工业制成品，如汽车、汽车零件和电子产品中创造大的生产利润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才智。日本化还指在海外建立日本工厂，这一行为在全球汽车工业里掀起了革命浪潮。托尼·阿尔杰（Tony Elger）和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这样写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日本化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不受限制的调查研究日程的标签，而不是一套对日本生产技术传播的范围和特点的强硬断言”。然而人们对“日本模式”的意识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铺开而增加，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东亚国家的政府和汽车生产商寻求日本的投资并鼓励引进新产品和生产流程。美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威胁激励日本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创造出新的生产平台。而且，日本政府喜欢把对外直接投资当做再循环日本大量的贸易顺差的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形形色色的角色带着复杂的动机，推动了日本化的进程。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挑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技术的领导者，并深入到几十年前还只是美国

公司所垄断的领域。日本的决策者把技术看做宝贵的国家财富，需要高度警惕地加以保卫；日本生产商非常渴望获得技术而且极不愿意丧失技术。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仔细地分析过这一过程。自从1945年以来，日本以几千亿美金的代价取得了其他国家开发出来的几百亿美金的技术。萨缪尔斯写道：“一旦买下这些技术，很快就会获准合作生产。合作生产之后就是合作开发。这些都在预算范围之内，也符合政治意愿，现在合作开发的项目今后将变成本国化生产。”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外国公司在专利应用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长，日本却与此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份额下降了大约50%。在美国和欧洲，外国公司在全部专利中所占的份额是日本的5~7倍。

在技术出口方面，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技术完全转化成商品之前，日本公司并不情愿丧失任何技术，而且日本技术出口到非附属公司的比例已经有所下降。长期以来，日本的东亚贸易伙伴对此都颇有怨言，因为它们的贸易数据显示出它们对日本技术极度依赖，日本是它们关键部件的主要供货商。比如，台湾的芯片产业，完全依赖日本的设备制造商。韩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完全和国际生产链条一体化了。在这个生产链中，日本公司往往起主导作用。产品的专门化和后向一体化加强了东亚贸易伙伴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正如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 Ernst）在第7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随着整个产业充满活力地发展，如果日本不愿意或不能开放技术就会触动日本和邻国的关系。日本仍然相当超然，抵制全球技术的呼唤——这一立场会带来区域性的后果。

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东亚出现了新一轮的日本化，这次的日本化浪潮和较早时候的日本化几乎没什么关系。如戴维·莱昂尼（David Leheny）（第9章）和白石隆（第10章）阐述的那样，日本的流行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刚刚变得富有的年轻一代“中间大众”的追捧，这些人遍布全东亚的大都市。日本的富足和技术上超强的能力侵袭了这些国家，日本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改变了消费文化。20世纪90年代，日本流行文化工业的产品——歌曲、电视节目、漫画、玩具、宠物小精灵（Pokemon）游戏、时装和食品，以真正令人瞩目的速度席卷东亚。今天日语在新加坡是最受欢迎的外语。日语不再被看做是能到日本公司工作的护照；相反，日语被看做能打开日本流行文化大门的魔法钥匙。新加坡和日本之间的学生交流以前数量很少，但是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创办的日文系，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学生需求，即便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新加坡政府开始弱化向日本学习的政策。日文系的教学任务是从新加坡的文化背景出发了解日本，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日本的社会习俗。

今天，日本的流行文化在全球都很有吸引力。“凯蒂猫”（Hello Kitty）是西式的，所以它可以在日本销售，而它又具有日本的特点所以又可以在西方销售。日本文化产业的部分吸引力来自于它们灵活、吸收力强的特点。日本的文化产品和特有的语言方式促进了它们在某一地区内的传播。它们最大的商业优势就是它们并不传递明显具有日本特点的信息。对此，安妮·阿利森（Anne Allison）这样总结道：

日本的文化产业触动了这个网络技术和后工业社会化时代的千禧儿童的想象力和生活。它们把灵活性和富有创意的想象合在一起转变成便携式的技术、超可爱的本质和形形色色不同寻常的产品形式。而且，当它在整个世界的儿童娱乐市场的声望（缓慢）上升的时候，日本正在让自己靠近全球文化的中心。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远离曾经一直被欧美（特别是美国）所霸占的文化（娱乐）潮流。

这个结论和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对亚洲民主化的立场相一致。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或第二大的对外援助国，总是避开明确的政治立场。相反，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在于改善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并往往采用有利于日本企业利益以及东亚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方式。当美国要求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时，比如用实施制裁来表示政治上的不支持，如果必须这样做，日本往往会追随美国，但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相信这样的政策是明智的。在亚洲创造充满活力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援助政策在短期和中期的核心利益，但是日本政府把创造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看做长期的事情，这不是靠治国艺术中的经济工具就能加快速度的。

新加坡的经历说明了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日本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新加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了非常有组织的“向日本学习”运动。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相对来讲，日本投资者的数目和日本在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就被放大了。如果说，东亚的某个地方曾处于日本化的集中影响下，那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而且，新加坡实现了现代化却并没有失去自我，它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行了创新并使之符合东亚的情况，因此新加坡的官员认为日本尤其具有相关性。

日本的某些做法和模式并不适合新加坡的情况。比如，日本式的管理即便是对于附属于日本的企业也不合适。新加坡盛行个人主义，由于缺乏对公司的忠诚，限制了员工对大型生产厂的依赖。而且像新加坡这种不同种族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和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无法不做任何改动就直接采用日本的管理方式。家庭是新加坡社会的基石，这就使得新加坡不可能转变成像日本那样以公司为基本文化单位的群体文化。新加坡的其他机制和做法与日本的制度和做法有很大关系。比如，质量控制圈在20世纪80年代被大规模引进到新加坡。同样的还有日本式的邻里警务，尽管新加坡的犯罪率比东京的低，但是对此的需求却很高。

新加坡日本化的种种经历揭示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自日本的最初的支持和对日本制度、社会习俗不时的效仿最终产生的结果是要进行一定的修改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再往后会对此越来越冷漠。伦·唐和 S. K. 甘丝毫没有担心日本化所带来的普遍影响，他们的结论是“自‘向日本学习’时代以来，日本公司和文化出现在新加坡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比，日本的影响是相当不够的。这是很荒谬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向日本学习”这个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戏剧性地减慢了速度。T. J. 潘佩尔 (T. J. Pempel) 这样写道：“无论是追随日本的领导还是允许日本成为亚洲通往西方的主要桥梁，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对效仿任何所谓的‘日本模式’是否是个明智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简而言之，在东亚区域的发展过程中，“雁行模式的日本化”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日本以外”。

美国化

日本化的情况也适用于美国化。一个多世纪以前，威廉·斯特德 (William Stead) 认为新世界对旧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在那个时候斯特德的观点也只能算得上是部分正确：美国的确在影响世界，但是世界也在影响美国。《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第三版)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把“美国化”定义为移民转变成美国人的过程。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在融合不同国家的影响方面，把美国、东亚和世界联系到一起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

美国化与全球化和西化关系密切，就像表兄弟一样，但是仔细分析的话，美国化

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全球化是普遍的现代化和具体的采纳美国的产品和做法的结果。自从17世纪以来，全球化缔造了美国，而不是美国缔造了全球化，这主要表现为将人口（其中有自由人也有奴隶）大量带到新世界。今天，由于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许多在其他国家出现的现代化的产品都披上了美国的伪装，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美国化的产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因为美国对移民的开放，许多产品（其中包括比萨饼、汉堡包和法兰克福香肠）看上去是地道的美国货，而实际上它们是进口货。

美国化的标志是英裔美国人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这是一个长达200年的传奇。这种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物质上的能力和制度上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美国今天在东亚的优势就像美国半个世纪前的优势一样。但是今天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原因是不再受传统的强权政治限制的那些进程正变得日益重要。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科技的领先者。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上大约2/3的未物化的专利技术来自美国，英国排在第二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从1977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把它们在海外的研发开支从7%提高到10%，这使德国和日本公司的同类数字相形见绌，经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日本科技上的差距再次被拉大了。

美国化还指美国流行文化被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世代所喜爱，每一个群体又创造出特有的次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合到一起又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对年轻人、日常生活、性别角色、世代交替、文学、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的美国化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洞悉东亚文化和社会变化的复杂过程。美国化既有积极的（财富、现代性、包容、启蒙）也有消极的（非亚洲的、文化上低人一等、肤浅的、物质至上的、贪求利润的）内涵。积极和消极的内涵又保持各自的特点融合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亚地区的极少数人开始接触到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后，东亚主要大城市的变化已经把人们从以前能接触到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变成熟悉这种生活方式。研究流行文化的人用诸如“文化的克理奥尔化”这样的概念来强调本土参与者在选择和分配美国大众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自我美国化”对于得到可以被那些不是处在民族同源的社会里，而是处在一个各种文化相互吸引的

复杂网络里的人，不受限制地进行无数重新组合的全部社会实践来说，并非一个不好的方式。

格尔德·格木登（Gerd Gemünden）这样写道：“美国化远非一个已经统一了或正在统一的过程。”比如，好莱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美国人所拥有，好莱坞的许多最著名的导演和演员都不是美国人。和唱片业的发展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在七大大莱坞电影公司中，只有三个是被美国公司所掌控：迪士尼、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然而，电影公司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对人们如何看待电影以及在好莱坞拍摄电影几乎没什么影响。实际上，外国电影制作人的涌入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在所有权和艺术天赋方面，好莱坞是世界性的。詹姆斯·弗尼尔（James Verniere）写道：“越离奇就越好。你最喜欢的美国电影经典是由来自别的地方的人执导的。”就像“自我美国化”，当代美国流行文化产业中的“他者美国化”说明美国和它的全球娱乐业之间的杂交性和多样性。

民主是阐释美国化的又一个侧面。从一开始，也许在世界政治中美国所肩负的使命中最重要的一面是威尔逊似的——通过模仿和战争，让世界安全地享有民主的统治。世界政治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曾尽力强化民主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在它的一些前殖民地；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欧盟在南欧和中欧；包括天主教会到大赦国际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在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中欧和东欧。可是，从历史和横向比较的角度看，美国人的努力以及它所产生的模棱两可的后果，是引人瞩目的。里根总统坚持要实现一场全球性的“民主革命”，从中美洲和中欧开始。这场革命要先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2003年，在布什政府为证明攻打伊拉克是正确的而提出的不计其数且往往在相互矛盾的理由当中，有一条理由非常突出，那就是希望从伊拉克的民主中受益。

在亚洲传播民主是美国所发动的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菲律宾（1986）、韩国（1987—1988）和印度尼西亚（1998）已经采用了民主的政府机制。在有些亚洲国家，尽管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强硬的或软弱的当权政府还在继续坚持原有的体制。虽然亚洲民主化的决定力量来自国内政治，但是在某些时候，来自外界的对民主反对运动的支持会使局面有所不同。韩国的民主化得益于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民主化目标的政治支持。尽管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是独裁的

马科斯政权的坚实后盾，最终美国政府还是改变了立场，促进菲律宾向民主化过渡。还有，苏哈托政权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紧接着就倒台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硬经济和政治要求帮助印度尼西亚推翻了美国政府支持了几十年的一个强制性的政权。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这样写道：“美国的崛起和主导地位使民主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亚洲式的民主和美国事先构想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携手并进的情况是相矛盾的。比如，无论是作为教义还是政策，里根经济学认为，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将会加强公众社会和政治上的民主。无论美国模式有哪些优点，东亚经济奇迹并没有支持这一重要的主张。相反，东亚经济奇迹证明了尽管有政府的干涉，民主化也有可能发生在市场竞争繁荣的情况下。在亚洲的民主化中，政治和社会等级被重新界定，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因此，东亚说明民主化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既可能发生在大型商业集合体也可能是在投票站里。

复合型区域主义和中国化

在东亚，日本化和美国化的进程已经融合到一起，使区域化超越了任何单一的国家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兵、第一次对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要求、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爵士乐、摇滚乐、口香糖、动画片和迪士尼动画、情景喜剧和巧克力，可口可乐和好运连连牌香烟，都在传递着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的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在世界政治中不断增长的相对实力、贸易和资本流通越来越自由化、跨国生产网络的铺开、环境退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反向运动、快餐连锁店、好莱坞动作电影和美国流行音乐都加深了东亚的美国化。

这种美国化已经和日本化融为一体。由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潜在的文化相似性以及日本比其他国家受美国化的影响时间更长，都使日本在调停东亚和美国之间的联系上发挥核心的作用。比如，日本的流行文化产业，常常把西方的感受进行剪裁以适应东亚人的口味。在时装业也同样如此。日本把美国和欧洲的想法转化成“对水平、色彩、品位和感情的判断力，这些都是日本和东亚，而不是西方，所共同拥有的”。

由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日本还负责调停美国政府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和商业需求及期待。在这种调停过程中，日本化在个人主义的意识上和集体的意识形态上留下的烙印并不太明显。比如，日本的流行文化产品是在整个东亚激发共同的文化经历的完美化身。日本的漫画正在成为东亚的漫画。与其说美国化和日本化的混合传播了某个突出的国家的模式，不如说这种混合有助于促进复合型的区域主义。

中国的崛起和东亚的“中国化”强化了复合型的区域主义潮流。这里中国化的含义既包括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还包括生活在东南亚的华裔人口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重新主张。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观察家都在推测中国治下的和平的到来：东亚不会抵消中国的影响而是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站在中国的一边。近来有关这样的猜测的记录并没有激起人们的信心。当金融泡沫破灭的时候，即将到来的日本治下的和平结束了；没过几年，美国由于持续赤字、惴惴不安并陷入自己选择的战争泥沼中，美国治下的和平也不得不就此低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对东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影响正在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化并没有按照中国的形式重塑东亚。相反，白石隆在第10章中的分析将我们指向另外一个方向。东南亚的中国化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作为少数族裔华人在东南亚的职业阶层中占很大的比例，并且控制着各个国家商业部门的大部分。1985年后日资的涌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华人阶层，这就产生了在区域层次上颇具变数的中国化。中国化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它的结果是复合型的区域主义。这样的区域主义是不可能让某个国家单独分离出来的。华侨在东亚所起的重要作用强化了这一地区复合的本质。

20世纪中期，华侨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他们曾受到大萧条、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以及民族主义者的反殖民革命的迫害。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他们在政治上和中国失去联系，东南亚的华侨受到了东南亚国家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同化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是民族建设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华侨商人跨越国界，进入地区和全球市场，他们的经济实力重新崛起。渐渐地，他们更多被看做东南亚政治中可以信赖的支持者，而非受歧视的贱民。华侨商人谨慎地调整了他们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中国和美国的投资比例大体相当。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的华人，尤其